



不断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肖光文

核心阅读

加强思政课建设关键在于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立场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思政课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学内容不仅仅要体现知识性、理论性、科学性，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现思想引导。

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为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深化教学改革，促进思政课在改进中加强，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加强思政课建设关键在于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立场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传道者自己首先明道、信道，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思政课教师“要站稳讲台，站好讲台”，就要在思政课教学内容上学深学透，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这就需要不断增强教师自身理论水平和学习能力，积极围绕教学中相关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在解决教学问题中提升科研能力，把科研成果有效融入课堂



教学，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实现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思政课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要始终坚持以德立学、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思政课教师应牢固树立好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的责任意识，更好地担起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找准课程结合点，推进最新理论成果进课堂

高校思政课建设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到与时俱进，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凝练和优化教学内容，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与高校思政课的有效结合点，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根据高校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同层次的思政课程，把最新理论成果等基本内容有效融入进去，不断丰富和完善思政课教学内容。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整合各门思政课有效资源，树立大思政课意识，推进各门思政课之间有效联动，实现思政课教学问题联合研究、联合攻关，形成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内部协同推进的良好机制。总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学的过程中要找准结合点，树立自觉融入的意识，形成融入的长效机制，进而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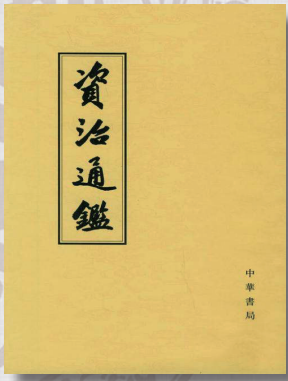
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思政课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学内容不仅仅要体现知识性、理论性、科学性，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现思想引导。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要聚焦社会现实重大问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学生喜爱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做好解疑释惑工作，不断增强课堂吸引力和感染力。要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在正确解答和释疑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把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积极回应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积极打好主动战，实现正面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让大学生清醒地认识到“我是谁，跟谁走”的根本问题，进而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加强思政课建设，还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新时期大学生成长特点，借助各种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和期待。我们要结合新时代互联网发展特点，搭建各种新媒体平台，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打造学习、实践、教学、资源于一体的思政课网络教育教学平台，让抽象的理论鲜活起来，让正能量传递起来，让课堂生动起来，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有机结合，实现线上与线下充分结合，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大学生的内化能力和思维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使理论真正走进大学生的内心，外化为大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当代大学生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使他们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之典范



□张帆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的話，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正因如此，《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并称为“两司马”。

—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名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很早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畅。大约40多岁的时候，司马光已经立下志向，计划编纂一部在时间上接续《左传》，记载由战国至五代史实的编年史著作。治平三年（1066年），他向宋英宗上呈了这部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战国和秦朝，一共八卷，名为《通志》。英宗看后十分欣赏，鼓励司马光继续完成后面的内容，并且下令为编纂工作创造一系列便利条件，包括配备助手、提供文具和勤杂服务、开放宫廷藏书、发放编纂津贴等等。次年英宗去世，新即位的神宗同样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赐书名《资治通鉴》，意思就是期待这部通史著作能够发挥“有资于治道”的借鉴作用。当时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主持改革，推行“新法”，司马光与其意见不合，受到排挤。从熙宁四年（1071年）起，司马光到洛阳担任闲职，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完成。次年神宗病卒，哲宗即位，新法废除，司马光入朝拜相。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又过一年就去世了。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300余万字。这样一部巨著，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几位助手在编纂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刘攽（1023—1089年）、刘恕（1032—1078年）、范祖禹（1041—1098年）和司马康（1050—1090年）。司马光先期完成的战国和秦朝部分，在全书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以下全书的绝大部分，亦即西汉至五代的内容，均由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编纂初稿。他们都是在相关史学领域造诣很深的学者，是由司马光亲自挑选的。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主要负责校正文字的工作。中国古代史书向来有官修、

私修之分，《资治通鉴》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既带有官修的一些特点，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私修。称其带有官修特点，是因为朝廷为其编纂提供了人力和物力支持；称其总体属于私修，是因为它的选题和编纂计划都出于司马光个人，编纂工作也是自由的，基本没有受到朝廷的干预。而且，虽然助手由朝廷配备，但人选都出自司马光的推荐。

《资治通鉴》编纂工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计划。首先，广泛搜集史料，标明事目，删汰重复，按时间顺序逐条加以排列，形成“丛目”，也就是兼具提纲性质的资料索引。其次，在对相关资料认真研究、辨析异同的基础上，本着宁繁勿略的原则编写出初稿，称为“长编”。其编纂方法，是按照时间次序，每遇一事，即查阅“丛目”列举的有关资料，融会贯通，形成文字。如果各项资料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有矛盾，就要选择其中较为可靠或接近情理者为主撰写，而将其余内容有异的资料以附注方式列于其后，并且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以上两个步骤的工作，由刘攽等三人分头完成。接下来的第三步工作属于司马光，他的任务是对长编进行剪裁删订，形成定稿。将长编删订为定稿这一“去粗取精”的工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除了剪裁内容外，还要进一步考核史实，订正疏误，润色文字，统一体例，撰写评论，任务非常繁重。司马光在洛阳居住14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二

《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用编年方式撰写历史，看上去比较简单，其实并不尽然。困难之一，是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不明，或是记载歧异。如果采取其他方式修史，对此或许可以进行模糊处理，但编年史不允许这样做，而是要把每件事情都尽量按照时间坐标放在合适的位置。《资治通鉴》编纂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资治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内容都是辨析时间的。今天看来，在日期等细节上还有一些疏误，不过大体准确。困难之二，是编年体史书会将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情前后割裂，妨

碍读者总体上的理解。针对这一问题，《资治通鉴》在遵守编年史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有时使用追叙法，记载本事后再追溯原因和背景；有时使用补叙法，记载本事后再直接说明其后果和影响，有时采用附叙法，由一事连带及相关史事。这样，尽管《资治通鉴》还无法完全避免编年体本身造成的叙事缺陷，但已经尽可能将这种缺陷降到了较低的程度。

其次，《资治通鉴》是跨朝代的通史。这个“通”又有上下限制，上限为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为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限的选择理由，是周天子在这一年册命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战国的开始，而《资治通鉴》正是计划从战国写起，在内容上延续《左传》。下限则是五代的最后一年，次年北宋就建立了。北宋作为当代史，是不在《资治通鉴》写作范围之内的。因此《资治通鉴》涵盖的时间共有1362年，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几大历史时期。就史料价值来说，战国秦汉距北宋最近，传世史料在北宋能见到的已经不多，因此《资治通鉴》的这部分内容大都取材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几部正史，虽然也用其他一些零散资料进行了补充，但比较有限。而隋唐五代邻近北宋，大批资料尚有保存，诸如唐朝和五代皇帝的《实录》等等，多为后世所未见，因此《资治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出于正史之外，相关的考证部分（称为《考异》）也保存着大量失传文献的片断佚文，史料价值最高。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取材广度和史料价值，则介于两者之间。诸多史料时代悬隔，性质有别，因而文风各异，但经过司马光等人的融汇和笔削，《资治通鉴》在文字上做到了风格一致，如出一人，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优秀叙事传统，文笔生动，常有传神的细节描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擅长叙述战争和动乱，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展现得有条不紊，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认识。这也是它大大高出后代同类著作的地方。

再次，《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是

“资治”，即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因此，它主要是一部政治史，记载重点是朝代兴亡始末、重大事件、君臣事迹、政见政论、战争战役、计谋策略。经济史的内容，尽管也有一些，但都比较零散，缺乏集中和整体的表述。文化史的内容更少，著名文学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在《资治通鉴》中都没有出现过，杜甫也只是被间接提到一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虽然有正面记载，但也都是从政治史角度来写的。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写作范围，对此我们并不能苛求《资治通鉴》。

三

出于“资治”的考虑，《资治通鉴》在叙事之外偶尔也发表评论。散见于书中的评论，共有218篇，长者上千字，短者仅20余字。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引用前人议论，共99篇；另一种是司马光自己撰写的评论，共119篇。因为有一事两论的情况，所以这218篇评论分别隶属于206项史事。《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以项计不止万数，附有评论者仅206项，可见它并不是一部乱发议论的书，凡是加以评论的地方都经过认真选择。选择标准大致有二：一是认为某人某事看似平常，实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而以评论形式提醒读者予以重视；二是某人某事在评价上可能产生歧义，因而发表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读者进行引导。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因其取材详赡、考订精确、体例严谨、叙事生动，历来受到高度赞誉。清人王鸣盛称赞它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就编纂计划之详细、进程之严格、工作之艰辛、编者之才学等方面而言，《资治通鉴》在古代史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成功实非偶然。



理直气壮上好新时代思政课

□陈万钧

要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主持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等重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持续加强。实践深刻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理直气壮上好新时代思政课，就要对办好思政课充满自信。党中央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我们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有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有长期以来思政课建设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有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

理直气壮上好新时代思政课，就要持续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一些学校思政课之所以效果不佳，与思政课内容不丰富、形式不新颖、教师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因此迫切需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全面提升思政课质量。要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发挥好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直气壮上好新时代思政课，就要推动学校思政课向社会辐射延伸。要统筹学校师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组织编写思政课精品教材，既要鼓励教学名师到思政课堂上讲课，也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知名专家学者到学校去讲思政课。既要针对学生讲好思政课，也要鼓励教学名师走向社会，为社会各界上好新时代思政课，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